

#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义\*

陈子焯

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左翼现代化理论曾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受挫的根源在于受到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陷入了全方位的“依附”状态，最终落得长期贫穷与落后。但上述理论提出的“脱钩”等发展战略却未能在实践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这一体系束缚。鲜少有后发国家突破“中心—外围”体系，实现从“外围”向“中心”的跨越。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虽然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发展，但它们的现代化模式都带有一定的“依附发展”色彩，本质上是不完全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脱钩”与“依附”之外的新发展道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发展成果。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sup>①</sup>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进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 一、“中心—外围”体系下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困境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左翼现代化理论主要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分析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受挫的根源。依附论提出“依附”概念来解释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即依附是一种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对称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一些国家可以发展并加强自己的同时，另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却受到前者发展与扩张情况的影响，这种扩展既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后果。<sup>②</sup> 后发国家非常容易陷入在“依附”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市场等发展资源，不得不依赖于“中心”的相关供给，但反而在内部形成以“中心”利益为主的畸形经济结构和依附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获利微薄。世界体系论则指出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形成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具有分化和剥削性质的结构，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交换的链条，不同区域承担不同的国际劳动分工并从中获利不同。后发国家往往处于并被固锁在“外围”，陷入落后与贫困。上述理论都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具体应用。两者都是从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关系出发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依附’的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3YJC710008）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22SJZDSZ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②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ol.60, No.2, p.231.

东方学刊 | 2023 年 12 月 冬季刊

来探寻后发国家现代化受阻的根源的。无论是“依附”还是“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划分，均是对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国际阶级分析。正如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所言，“中心”对“外围”的剥削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对其国内工人的剥削。<sup>①</sup>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与发展，其“中心—外围”的特征也日益稳固，越是后发国家，其挣脱体系束缚的难度越大。在这一体系形成的早期，由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自由竞争和危机转嫁空间，德国等相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较多机会通过国家力量的干预突破“中心—外围”体系，获得自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但 20 世纪之后的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在自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还保持独立自主。左翼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帮助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话语霸权，却未能在实践中为后发国家提供行之有效的摆脱依附体系的发展战略与方案。例如，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拉美，在减少了对“中心”工业制成品的高度依赖之后，又再次陷入对“中心”中间品和技术的依附之中，使“进口替代”战略难以维系，再次遭遇发展危机，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药方。

相较之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依附”与“脱钩”之外的新道路，相对成功地突破了“中心—外围”体系，实现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一切切实地为苦于“中心—外围”体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信心和借鉴。

##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

近代中国也曾深深受制于“中心—外围”体系，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更是处于对西方资本的典型“依附”状态。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才获得新生，并逐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经历过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已逐步从“外围”上升至“准中心”，并继续向“中心”迈进。<sup>②</sup>这一地位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对依附体系的逐步摆脱与突破。

### （一）经济突破：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稳步向中高端攀升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在经济上呈现出经济依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中心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使外围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处于低端地位，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分配。因此，中国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核心在于，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改善国际分工收益。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处于实际上的“脱钩”状态，这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难以从外部获取发展资源，因而付出了高昂代价。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了基本完备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这为中国后续摆脱经济依附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动力。<sup>③</sup>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善

<sup>①</sup> Andre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1, p.30.

<sup>②</sup> 参见翟婵、程恩富：《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上海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sup>③</sup> 参见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义

于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趋利避害地利用外部发展资源，使其真正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由此在一个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并不断壮大与突破。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已经从“外围”迈入“准中心”。这具体体现在如下经济方面的改善上，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

第一，中国已逐步摆脱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市场”依附，正从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依附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具体表现与特征。依附论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将历史上的“依附”形态划分为：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sup>①</sup>随着世界经济基本形态的发展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经济依附也因而呈现新的“技术—市场”依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凭借在核心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对市场终端的控制成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这两种主要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因而在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并获得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处于甚至被锁定在低端，只能获得低附加值。<sup>②</sup>中国对经济依附的突破也正是以技术端和市场端为突破口的。从技术端来看，近年来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与提升，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甚至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例如，在信息通信领域，有最新报告数据显示，“华为的5G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占比为14.59%，位列第一；高通排在第二位，占比为10.04%；三星排在第三位，占比为8.80%。另外，排名在前十位的企业还有大唐、中兴、OPPO和小米四家中国企业”<sup>③</sup>。再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根据《2022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和美国同处第一梯队。中国在专利产出、论文产出、人才培养、创新制度、网络基础等多个评价指标上均有显著上升，排名进入前五位的指标由2020年的12个增长至2022年的18个。<sup>④</sup>从市场端来看，中国本土市场的潜力不断被激发，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中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过去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情况。从宏观数据来看，202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达到2.7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近11%，仅次于美国。<sup>⑤</sup>正是在技术端和市场端的突破与进步，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低微、收益微薄的局面。再来看一组数据，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均呈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见图1）。2010—2018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增加值从842美元增长至897美元。<sup>⑥</sup>特别是自2018年中国遭遇美国率先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以来，对中国出口“被转移”和中国高科技公司“被卡脖子”的担忧日益升级，尽管中国难以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但

①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34—335页。

② 陈子焯、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27页。

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3年4月），中国信通院网站，<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4/P020230421528385442774.pdf>，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9月1日。

④ 易蓉：《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出炉，中国连续3年世界第二》（2023年7月7日），“中国日报网”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767876307748828&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9月1日。

⑤ 《商务部：中国进口总额达2.7万亿美元 占世界进口总额的近11%》（2023年4月23日），中新网，<https://www.chinanews.com/shipin/cns-d/2023/04-23/news957440.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9月1日。

⑥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images.mofcom.gov.cn/zys/202101/20210126142050237.pdf>，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11月30日。

东方学刊 | 2023 年 12 月 冬季刊

从中国出口情况和高科技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韧性。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后的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以及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份额均不降反升，展现出明显的产业竞争力上升和产业链升级趋势。2019—2022 年，中国出口在世界中的占比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达到 14.6%；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上升了 3 个百分点，达到 30.3%，其中，以新能源汽车、电子、机械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在世界出口市场占比的持续上升作出了重要贡献。2019—2022 年，中国光学、汽车、机电等产业的全球出口份额分别增长至 14.8%、8.1% 和 28.3%。<sup>①</sup> 遭遇美国断供高端芯片的华为公司在经历了短暂低谷之后，于 2023 年再次推出搭载自研芯片的 Mate60Pro 机型，重新返回全球高端手机市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华为手机 2023 年第二季度的市场份额增幅达 76.1%，再次跻身全球高端手机市场前列。<sup>②</sup> 同时，中国在汽车、大飞机等相对弱势的技术领域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例如，2023 年中国商飞自主研发的 C919 国产大型客机已经成功开启商业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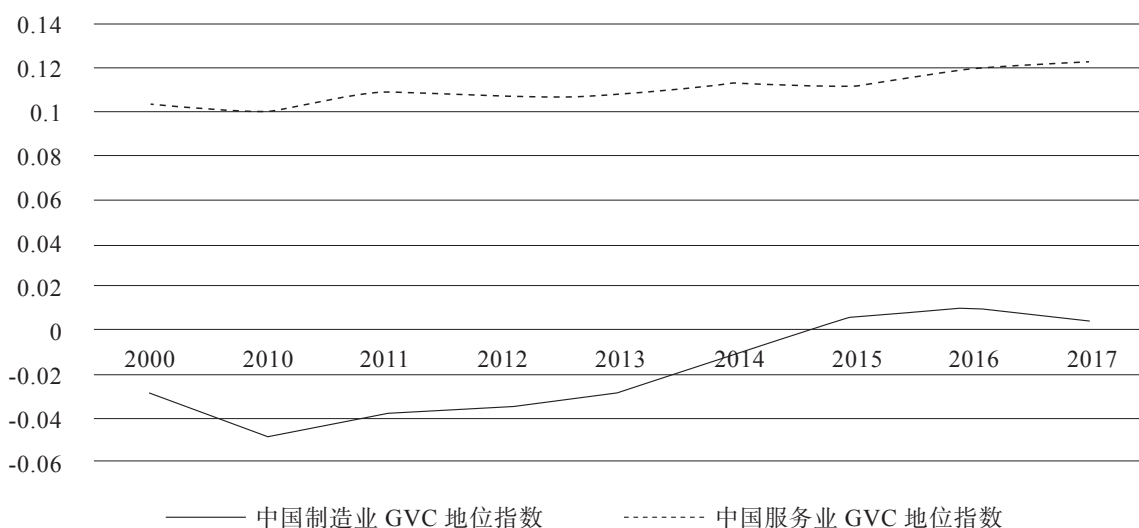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7 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概况

数据来源 刘雨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其对策》，《全国流通经济》2021 年第 10 期，第 136 页。

第二，中国正在实现从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重大转变。通常而言，“中心—外围”中的中心国家由于资本充裕，往往也是资本输出大国，而外围国家由于资本匮乏，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通常为负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保持着吸引外资的政策，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非常庞大且保持持续增长的走势；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资本积累总量的增长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也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见图 2）。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直接投资元年。<sup>③</sup>

<sup>①</sup> 华泰证券：《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报告》（2023 年 4 月 17 日），下载自未来智库网站（<https://www.vzkoo.com/>），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sup>②</sup> 《逆势上涨 76.1%，华为公布 2023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2023 年 8 月 11 日），“机智猫”搜狐号，[https://business.sohu.com/a/710932757\\_239259](https://business.sohu.com/a/710932757_239259)，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sup>③</sup> 于佳欣、赵超：《对外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中国即将成为对外净投资国》（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5-01/16/content\\_2805546.htm](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5-01/16/content_2805546.htm)，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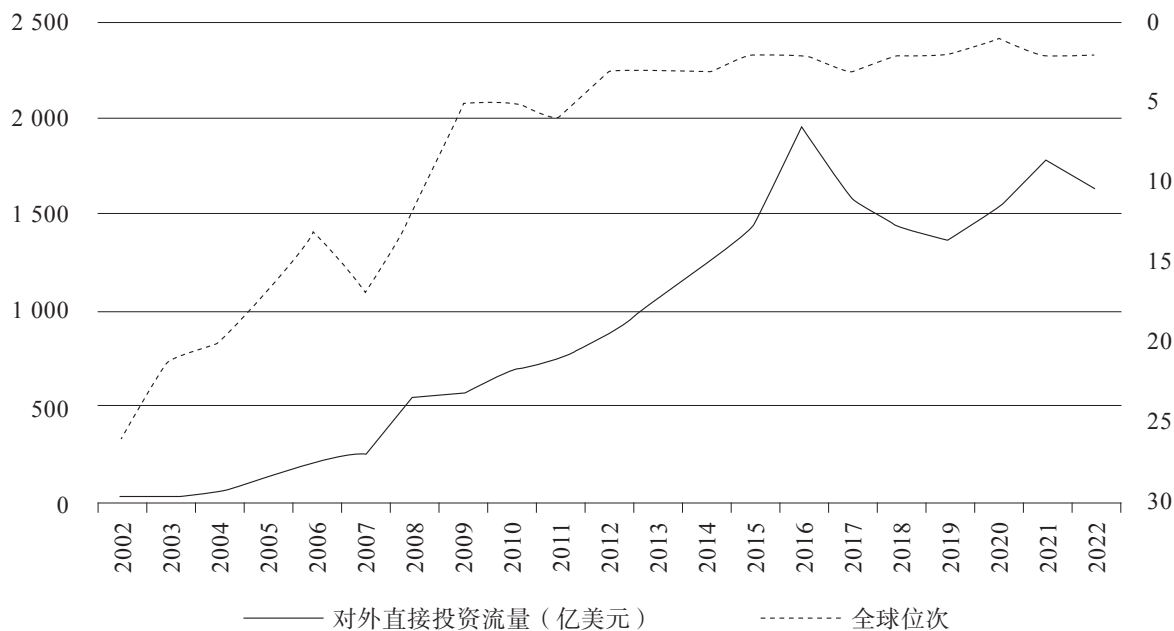


图2 2002—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数据来源 商务部：《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年9月，第7页。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迈出新步伐。中心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主权货币具有国际货币性质。除了公认的世界货币美元外，欧元、日元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特权。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系统规划和稳步推进下，中国已经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取得了重要进步。根据 SWIFT 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量翻了一番，目前占整个支付市场的 4.5%（欧元占 6%），如果加上非 SWIFT 交易，实际支付的份额将会更高。<sup>①</sup>

### （二）政治突破：中国智慧和方案方案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心—外围”体系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束缚作用还体现在政治层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中心—外围”首先是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结构特征的描述，那么基于这种国际经济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与法律上层建筑——以全球治理为具体表现，也必然为维护这种国际经济基础服务，因而呈现出“中心”对全球制度建设的主导，及“外围”对“中心”的内外政治依附。<sup>②</sup>例如，为了维护技术垄断地位，发达国家主导建立和推动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越来越呈现出过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倾向。在保护对象、保护时间和保护范围上皆有不断扩大和延长的趋势。<sup>③</sup>对于中国而言，其内部的依附性政治结构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被基本消除，但对外依然在与由西方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斗争。随着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也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大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sup>①</sup> 《国际化速度超乎想象，人民币迈出对抗美元霸权一大步》（2023年4月24日），“金投网”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4046716148691352&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9月1日。

<sup>②</sup> 李滨、杨蓉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

<sup>③</sup> 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东方学刊 | 2023 年 12 月 冬季刊

文明倡议等重大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获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也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sup>①</sup> 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双边共同体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共同体越来越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不断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已经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切实的重大成就，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十年间，以“五通”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格局不断发展。例如，在设施联通方面已经形成了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础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格局。截至 2023 年 6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7.4 万列，“丝路海运”航线已通达全球 43 个国家的 117 个港口。在资金融通方面，已经形成了日益健全的金融合作机制和平台。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共有 13 家中资银行在 50 个共建国家设立 145 家一级机构。丝路基金累计签约投资项目 75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220.4 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为共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截至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可能让相关国家的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sup>②</sup> 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在实践中所践行恪守的“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相互尊重”等理念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助力，特别是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治理中被边缘化的地位提供了新路径。

### （三）文化突破：正加快建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sup>③</sup>。“中心—外围”式的国际经济基础在文化上层建筑中也呈现出“中心”的文化霸权与“外围”的文化依附特征。“外围”的文化依附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主要反映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例如，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曾指出，外围国家的高收入阶层热衷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使得外围国家的现代化带有文化依附的性质；这种文化依附将成为依附结构再生产的原动力，使得依附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随着中心国家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技术的更新而重复出现。<sup>④</sup> 依附论学者多斯桑托斯也曾经批评拉美文化中出现的文化异化现象，即拉美知识分子从宗主国角度，按照宗主国的标准、利益和价值观去审视本国，这种文化依附是维持和巩固依附性结构的重要因素，是把不发达状态留存下来的关键。<sup>⑤</sup> 就中国而言，近代中国也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存在半封建文化，也因受到帝国主义文化的严重渗透而存在一定的依附文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载《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2 日，第 3 版。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2023 年 10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10 月 20 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178 页。

④ 转引自袁兴昌：《对依附理论的再认识——依附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基本思想（上）》，《拉丁美洲研究》1990 年第 5 期，第 4 页。

⑤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 309 页。

##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义

领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程中，逐渐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在文化建设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凝结着中国精神、彰显着中国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但在国际层面，长期存在话语权上的“西强东弱”，特别是中国常常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攻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上升，已经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进一步从文化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中突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语言、宗教和道德形式呈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通过施加某些思维与分析的方式，尤其包括通过传导某些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sup>①</sup>。例如，二战后西方国家改造了“民主”概念，构建起一套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所谓“自由民主”理论体系，并以社会科学方式融入并在世界推广，使人们习惯使用西方概念与思维思考问题。这更加凸显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自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加快成果转化，已取得了一系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 三、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既对推动左翼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完善，乃至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摆脱“中心—外围”体系束缚之道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一）有助于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1960年代以后，以西方为中心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遭到挑战。那些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药方去模仿西式现代化的亚非拉国家大多陷入经济停滞或衰退、政治动乱、社会动荡之中。这一现实促使人们批评和反思西方中心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正是以激烈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面貌出现的，由此初步打破了对西式现代化的迷信与崇拜，动摇了其世界话语霸权。然而，上述左翼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局限不仅在于其理论内容本身存在的问题，更在于其未能在实践中为广大后发国家突破“中心—外围”体系提供行之有效的战略与方案。

例如，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论者曾提出激进的“脱钩”方案，即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减少甚至切断经济联系来摆脱这一体系的剥削，由此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客观背景下，这种发展方案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再例如，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还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扫除和改造依附性的国内结构，进而使对外关系获得摆脱依附的国内政治基础。但该方案对于社会革命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性与困难性缺乏充分的估计，并非现实有效的具体战略和策略。无奈之下，以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为代表的学者证明了妥协的“依附式发展”方案的存在，即在某些后发国家，在

<sup>①</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in Marc A. Genest,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Wadsworth / Thomson Learning, 2004, p.217.

东方学刊 | 2023 年 12 月 冬季刊

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政府、本国资本和跨国资本之间形成了“三方联盟”，因而出现了在依附状态下也获得较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sup>①</sup>然而，一方面，这种“依附式发展”只是少数国家能够获得的；另一方面，这种依附式的现代化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从长远来看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成功实践实际上开辟出了一条“脱钩”与“依附”之外的新路径，不仅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变成现实，并且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扬弃并超越了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左翼现代化理论，既为其理论的修正与完善提供了鲜活案例，也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发展。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中心—外围”体系提供了新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成功经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克服一些导致“依附”的共性因素。特殊性则体现在中国克服这些因素的方式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成功经验尽管不能被照搬照套，但依然对广大后发国家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自主国家的基本构建是摆脱这一体系的关键政治前提。前述提及的各种摆脱“中心—外围”体系的方案之所以在实践中多以失败告终是复杂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也存在导致失败的共同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相对缺乏。由于国家沦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无法做到对内摆脱利益集团掣肘、对外反对霸权主义干涉，无法持续地按照公共利益方向推进发展战略，使各种摆脱依附的发展方案无法在实践中找到突破依附再生产的恶性循环的突破点。就中国经验而言，这种自主国家的构建主要是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初步扫除了国内旧的依附性结构，为后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奠定了基本政治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以政治逻辑超越经济逻辑，通过政治方式初步构建一定的国家发展自主权，以此作为破除依附的恶性循环的突破口，是中国经验提供的重要启示。另外，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成功经验表明了从内部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可能性，这与过去那种尝试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方案形成鲜明对比，也更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

## 四、余论

尽管中国已经相对成功地实现了从“外围”向“准中心”的跃升，但 2018 年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未来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中心”迈进，仍面临不小的外部阻力。本文认为，克服这些阻力，继续向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彻底地突破旧有的“中心—外围”体系，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继续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提供制度保障。努力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是中国彻

<sup>①</sup>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42–176;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心—外围”体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义

底突破技术依附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继续迈向“中心”的关键所在。在国际竞争和博弈日益激烈和复杂的新国际形势下，中国应继续积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特别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来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坚持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动员并协同政府、市场、社会各界等多方面力量，凝聚成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

第二，通过扩大内需、加快自主创新，促进新发展格局早日形成。加快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彻底摆脱市场依附的关键一步。其中，扩大内需是促进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向，而内需的扩大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以创新引领来创造新的需求。另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求中国经济在封闭中运行，突破市场依附也绝不能走与世界经济“脱钩”之路，而是应该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在开放与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三，进一步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话语。如前文所述，“外围”对“中心”的文化依附是“中心—外围”体系得以维持并加强的重要原因，加快建构立足本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彻底摆脱文化依附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勇于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积极尝试突破各类学科中的西方传统范式、理论和概念，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立足中国实践，面向中国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另一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绝不能闭门造车，要合理地吸收一切国外文明的有益成果，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